

基于语料分析的政治语篇互动元话语研究

陈京京

(宿迁学院外语系 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元话语是近年来话语分析领域的新热点。通过对各子范畴的分布特征、分布差异原因和隐性评价,可论证互动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的重要作用和人际意义。而基于小型语料库对互动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的使用情况和功能研究,可为元话语的语体分析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语料;政治语篇;互动元话语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5)04-0057-06

A Corpus – based Research into the Interactional Meta – discours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CHEN Jing – j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Suqian College, Suqian 223800, Jiangsu, China)

Abstract: Meta – discourse is a currently new focus in discourse analysis. The importance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 of Interactional Meta – discours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will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respective reasons of distributional differences and implied evaluation of subcategories in meta – discourse. Based on a small – sized corpu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and function of Interactional meta – discours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which will give a new insight into the stylistic analysis in meta – discourse.

Key words: Corpus; Political discourse;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元话语是语篇分析中的常用术语,帮助构建表意连贯的语篇,起到连接语篇和语境的作用,并传递作者或说话人的个性、可靠性。各种将语篇和语境联系起来的衔接手段和人际手段都包括在内。国外最早提出“元话语”一词的是语言学家 Harris。他认为元话语是理解语言使用、表示作者或说话人引导受众理解语篇的一种方法。之后,Williams、Vander Kopple、Crismore、Hyland^{[1][2][3][4]}等进一步对元话语进行了语类分析和理论探讨。近年来,国内语言界、教育界对元话语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尤其是写作、口语、修辞等方面^[5-6]。虽然学者们对元话语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逐步深入,但很少将其作为特定语篇的分析方法加以研究,或仅停留在话语分类上,没有真正从语篇角度探讨元话

语的功能,更很少涉及政治机构话语。

美国当代语言学家乔治·拉科夫说“政治即是语言,同时语言也是政治。”可见,研究政治语篇中元话语的使用及功能,对政治理念的解读和人际功能的体现有重要意义。语篇在交换信息的过程中,互动式元话语可协助发话者对语篇介入和评论,逐渐影响受众理解并接受其思想观点,语篇与政治通过元话语密切结合。本文将以 Hyland 对元话语的分类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7],尝试探讨互动元话语在政治语篇构建中的特点和功能,有利于深入了解政治文体,提高正确使用元话语的能力。

一、基本话语和元话语

“话语”(discourse)是指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言语

收稿日期:2015-03-09

作者简介:陈京京(1981-),女,江苏宿迁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话语分析、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YY020)阶段性成果。

行为,包含了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话语由基本话语(primary discourse)和元话语(meta-discourse)两个层面构成。其中,基本话语表达关于话题的命题信息;元话语指超越主题的材料,告诉读者如何参与、评述关于话题的命题信息。

元话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元”概念的提出始于对内省法的自我证明悖论的哲学思考^[8]。Comte认为内省法存在“自我证明悖论”,哲学家 Alfred Tarski 为解决这一悖论引入了 meta(元)的概念。他认为,元**即关于**的**。Hyland 也认为元话语是用来协商语篇互动意义的自我反省表达形式^[7]。它与基本话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首先,内容不同。基本话语通过陈述主题、阐述观点等方式进行言语交际,主要表达关于话题的命题信息。元话语涉及的是交际主题之外的内容,主要进行组织话语结构,调节和监控话语交际过程。其次,目的不同。基本话语以命题信息传递为目的,而元话语从受众角度出发,引导其更好地接受信息,以起到调控和组织话语的目的。再次,作用方式不同。基本话语直接使受众接受命题信息,而元话语体现的是作者在创建命题内容时的交际动机,使受众间接地获取命题信息。

二、元话语的分类及功能

作为话语交际的重要组成,元话语的人际意义尤为突出,同时语篇意义也是元话语的重要特征。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看,元话语兼具语篇连接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元话语的分类研究一直在持续着。Vande Kopple 把元话语分为篇章元话语和人际元话语两类^[2]。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Hyland 总结强调了元话语的 3 条基本原则:元话语指语篇中作者与读者互动的部分;元话语只指话语内部关系;元话语与话语的命题不同,但命题内容并不排除元话语。同时,Hyland 和 Tse(2004)认为,前人的两分法不能具体细致地反映元话语的本质特征^[7]。结合这 3 个原则,Hyland 修正了元话语分类模式,把元话语分为引导式和互动式两类范畴,每类分别细分为 5 个子范畴。其中引导式元话语侧重对受众的引导,关注如何组织话语。互动式元话语则更多地考虑人际功能,帮助建立与受众的互动关系。鉴于政治语篇发话人语言主观意义受机构目的驱动^[9],本文旨在探讨元话语在其中的人际互动性。表 1 是我们在研究中所采用的理论框架:

表 1 互动式元话语

范畴	功能	子范畴	功能	英语举例	汉语举例
互动式元话语	增强与受众的互动关系	模糊语 (hedges)	减弱对命题的确定	might / perhaps / possible / about	或许;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在某种程度上
		增强语 (boosters)	强调作者对命题的确定	in fact / definitely / it is clear that	毫无疑问;当然;很显然
		态度标记语 (attitude markers)	表达作者对命题的态度	unfortunately /surprisingly	很遗憾;令人兴奋的是
		自称语 (self-mentions)	指作者自我	I / we / my / our	我;我们
		介入标记语 (engagement markers)	建立和受众的关系	consider / note that / you can see that	你(们);亲爱的读者

注:表 1 结合了 Hyland 对元话语分类的研究和李秀明^[10]对汉语元话语标记的分析。

三、研究过程

(一) 设计问题

本研究分析互动式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的使用情况和各子类别的分布特征及功能,旨在分析(1)互动式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的出现频率,及各子范畴的分布使用情况;(2)什么导致了互动式元话语各子范畴在政治语篇中的分布差异;(3)如何通

过互动元话语这一隐性的评价资源实现对政治语篇的评价。

(二) 语料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基于自建小型语料库进行分析论证的。政治语篇是国家和政府立场的代表,包括具有外交性质的官方发言和文件。我们所分析的语料是从 2012-2014 年度权威媒体发布的重要政治语篇,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十八大报告、习近平主席、李克

强总理的讲话。共 289500 字。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模式对政治语篇中的元话语进行研究。定量方面,我们采用人工标注辅以计算机 Kconcordance 检索工具,统计出互动式元话语各个子范畴在政治语篇中的出现频率及分布情况。定性方面,主要讨论造成分布差异的原因及元话语的互动功能。

(三) 数据收集

表2 互动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的分布

分类	出现频次(次)	占总数比例(%)
模糊语	256	11.0%
增强语	425	18.2%
态度标记语	92	3.9%
自称语	1432	61.5%
介入标记语	126	5.4%
总计	2331	100

经过统计分析(见表2)我们发现,互动元话语手段在政治语篇中使用频繁。30篇政治语篇中的各类互动元话语标记 2331 个,这充分说明了元话语使用的广泛性。另外,我们从数据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自称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其它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频率,出现 1432 次,占互动元话语总数的 61.5%。当然,鉴于政治语篇的特殊语体,这里的自称语包括“我”、“我们”、“我国”等几种表达方式。其余使用频率较高的互动元话语类别依次为增强语(18.2%)、模糊语(11.0%)、介入标记语(5.4%)、态度标记语(3.9%)。

(四) 分析与讨论

Hyland 将元话语定义为用来协商语篇互动意义的自我反省表达形式,强调评价、态度和参与等人际意义。在元话语的 3 个基本原则中,Hyland 强调所有的元话语都是人际的,指语篇中作者和读者互动的部分。

互动元话语用于表征发话人的意图,目的在于增强与受话人的互动关系,凸显语篇的人际性。本研究将采用 Hyland & Tse 的元话语分类^[7]框架,从模糊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自称语、介入标记语共 5 个子范畴分析政治语篇的互动元话语。

从分析数据可以看出,自称语是政治语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互动元话语手段,在自建语料库中,共出现 1432 次。自称语指发话人明确提及自己,拉近与受话人的距离,意图让对方加入语篇中,表达作者对话篇的明显介入,实现对语篇的隐性评价。例如:

例 1: 这里我要强调,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同时我们维护本国领土主权的意志也是坚定不移的,愿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主张也是明确的。

例 2: 我们竭诚尽力,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制度建设,兜住对话篇话语的监控和调节逐渐使受众建立起意识形态。民生底线,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例 3: 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自称语表征发话人在话语中的外显程度。政治语篇属于机构话语,而机构话语又分为机构目的和个人目的。个人目的的表达通常用单数第一人称“我”表示,由于政治语篇的文本特殊性,“我”的提及仅在表明或强调受话者身份时才会使用,而出于机构目的用法,一般用复数第一人称表达,如例 2、例 3 中的“我们”、“我国”。海兰德认为,“发话人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和自己对命题内容、所在的共同体以及受话人的态度投射到话语中。发话人通常根据自己的立场与当时的情景身份有意识地选择是否使用自我指称”^[7]。发话人在话语中出于机构目的,大多使用了“我们”等包括受话人在内的自我提及标志。与受话者形成互动的同时,不仅树立政府权威,话语的客观性也得以增强。值得注意的是,短语“自我完善、自我监督”中的“我”不属于“自称语”,因为这里的“我”并不涉及听众观点的介入,只是语篇中的一般内容。

研究发现,自称语还常常与态度标记语连用,以此提升与读者的人际互动关系。如:

例 4: 我们相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香港、澳门同胞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我国政治语篇中,大多以机构目的为主,因此态度标记语与自称语的连用,体现的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和政策方向。

模糊语由一些具有缓和功能的词语组成,指话语中模棱两可的词语,减弱对命题的确定程度,显示作者在表达或评价命题时所采取的保守的、不完全承诺的手段。在语料库中,模糊语共出现 256 次,占互动元话语总数的 11.0%。发话人可以通过模糊

语隐藏自己的态度,缓和信息的重要性,同时提供了与受话人之间的协商空间,避免了命题被推翻的可能。例如:

例 5: 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还不牢固,增长的内生动力尚待增强。财政、金融等领域仍存在一些风险隐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宏观调控难度增大。

例 6: 中央财政收入一度出现多年少有的负增长,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一度异常升高,国际上出现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声音。

例子中“部分”、“一度”、“可能”等模糊语的使用,为话语准确性预留了一定的商讨空间,缓和了信息的可靠程度,体现了发话者适度、谨慎的态度,这也是政治文体的严谨性的客观要求。

与模糊语相反,增强语强调发话人对命题的确定性,是从语料分析中显示的,增强语出现的频率比模糊语高,共出现 425 次,占互动元话语总数的 18.2%。政治语篇是德国翻译理论家赖斯所说的信息型文本。要想传递信息,力图说服受话者理解并接受话语内容,发话人不仅要加强语气,更要在陈述内容上强调确定性,使受话人没有商谈的余地,促成政治观点的影响作用。

例 7: 只要地区各国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够继续发挥亚洲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的作用。

例 8: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要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例子中的增强语“一定”表明了发话人对亚洲地位的信心,对受话人起到鼓舞作用。“决不”则体现了发话人的强硬语气,展现中国政府对腐败现象斗争到底的决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模糊语与增强语共同构成一个统一体的两端。前者倾向于互动,存在协商的空间;后者则屏蔽受话人的反对意见,不给协商留有余地。“由于文本中模糊语与增强语的平衡显示出发话人愿意考虑其它选择的程度,所以二者在体现发话人对文本内容的确定性以及对受话人的维护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7]概括地讲,增强语有助于凸显发话人的主体性,而模糊语则更多地体现了主体间性。

态度标记语体现发话人的主观情感,表明发话者对命题的态度,而不是认识的态度,包含了惊讶、赞同、重要性、义务、沮丧等。由于政治语体的特殊性,态度标记语出现的频率最低,共出现 92 次,仅仅

占互动元话语总数的 3.9%。

例 9: 我们坚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主导地位,RCEP 和 TPP 应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补充,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希望 RCEP 在 2015 年能够达成协议。

基于政治语体的发话人代表的是国家机构,个人态度很少表达,仅在表呼吁或赞赏的话语中才会出现。我们在语料库中检索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介入标记语是发话人引导受话人按自己意愿理解话语的元话语手段,由那些明显地指向读者的词语组成。它们被用于集中读者的注意力或引导读者参与到语篇中来,通常用第二人称代词“你”、“你们”或“各位代表”等涉入性代词凸显受话者的被引领地位。

例 10: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介入语体现了发话人的意向,起到吸引受话者注意力的作用,在政治语篇中的邀请性更突出,发话人根据自己的话语目的,意图构建顺畅的沟通模式,受话者的参与尤为重要,介入语则起到了引导受众认同,劝说其接受主题内容的功能。

从目前的研究看,元话语仍然是相对“笼统”的概念,说法不一。对其性质的见解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直接影响这一话语手段在语篇分析中的研究。Hyland 和 Tse 的分类忽略了 Halliday 语言“三元论”中的概念意义,另外,“增强语”和“模糊语”有时也是发话者态度的体现,“自称语”和“介入标记语”也有重合的部分,因此,对元话语的分类标准、具体划分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四、结论

针对研究设计初始提出的 3 个问题,笔者现在可以做出回答。

(一) 互动式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的出现频率,及各子范畴的分布使用情况

本次研究的对象是政治语篇,通过自建一个小型语料库来探讨互动元话语的使用情况。上文已经统计过各子范畴的分布使用情况,按使用频率排序,依次为自称语、增强语、模糊语、介入标记语、态度标

记语。

(二) 政治语篇中的互动式元话语子范畴分布的差异原因

政治语篇主要包括两种语篇模式,劝说性和宣传性。无论哪种模式,它们都以受话人为研究对象,发话人为了体现国家或政党的政治观念,让对方理解并接受命题内容,需要充分利用元话语的表达手段。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同时具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这3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语篇意义^[11]。其中语篇的互动性指说写者、听读者、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12],体现了作者和读者间人际意义的构建,是语篇意义产生的重要条件。政治话语的目的根据语篇模式具有双重性,劝说性政治语篇是让受话人参与到语篇构建中,以邀请者的身份引导其参与其中。而宣传性政治语篇中的发话者通常以说服为目的,竭力与受话者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劝说性语篇为主,互动元话语使这一特殊的语体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以后其他文体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不同体裁的语篇语用功能有所不同,互动元话语子范畴的分布差异正源于此。首先,政治语篇严谨正式,回避个人感情,为了体现语篇的交际功能,发话者必须和受话者进行有效地劝导式交流,自我提及的变体形式就随之产生并被大量使用。其次,增强语的使用仅次于自我提及。政治语篇中的发话人在表达力图说服受话者理解并接受话语内容时,要加强促成政治观点的影响作用就要在词汇上加强语气,才会有助于凸显发话人的主体性,同时也是政治话语的劝导性要求。相反,政治语篇中的发话人在陈述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命题内容时,倾向于采用模糊语,通过巧妙地隐匿态度,不给对方商谈的机会,体现了政治话语的谨慎性。再次,介入标记语在语料中呈现单一性的特点。如语篇开头若采用一种涉入标志,全篇基本都是上文提及的相同标记语,突出了受话对象以吸引其参与语篇。最后,态度标记的使用基于政治语篇客观性的语体特征,有些政治文本中全篇没有态度标记。

(三) 如何通过互动元话语这一隐性的评价资源实现对政治语篇的评价

互动元话语主要通过具有评价色彩的语言之间的联系实现隐形评价。政治语篇中的自称语通过单数第一人称“我”,复数第一人称“我们”、“我国”与

受话者形成话语联盟,把自我(政府)评价构建为整体评价,从而拓宽协商空间,减少负面评价效率。介入标记语把受话者视为语篇参与者,直接体现发话人的意向,起到调控受话者参与频率的作用。增强语增加语篇信息的确定性,受话者易于理解并接受命题内容。模糊语使发话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武断言论,给受话者的预测留有空间,使语篇气氛更加融洽。互动元话语虽然本身没有显性的评价功能,但对于探讨语篇的评价策略具有积极作用^[13]。

结语

Hyland(1998)^[4]指出,在多种体裁下,进行描写性实证研究对完善和发展元话语理论模型有重要意义。发话人目的与意向直接影响政治语篇的互动元话语选择,同时,合适的元话语手段有利于发话人构建与受众的互动关系。因此,互动元话语是政治语篇实现人际功能的重要途径,元话语也能够帮助读者组织、解读、评价语篇所提供的信息^[14]。希望笔者关于政治语篇中互动元话语的研究,对于拓宽不同语类的描写性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 Williams, J. M. Style: Ten Lessons in Clarity and Grace [M].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981.
- [2] Vande Kopple, W. Some Exploratory Discourse on Metadiscourse [J].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1985(36).
- [3] Crismore, A. Talking with Readers: Metadiscourse as Rhetorical Act [M]. New York: Peter Lang, 1989.
- [4] Hyland, K. Persuasion and context: The pragmatics of academic meta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8, (30): 437 - 455.
- [5] 张贤芬. 元话语的使用及其与写作质量的关系 [J]. 扬州大学学报, 2004(10).
- [6] 余新. 元话语理论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证研究 [J]. 宁波大学学报, 2010(1).
- [7] Hyland, K., P. Tse. 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writing: A reappraisal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4, (25/2): 156 - 177.
- [8] 汪玲, 方平, 郭德俊. 元认知的性质、结构与评定方法 [J]. 心理学动态, 1999(1).
- [9] 李洪儒. 试论语词层级上的说话人形象 [J]. 外语学刊, 2005(5).
- [10] 李秀明. 汉语元话语标记研究 [D]. 上海: 复旦大学,

